上不负祖先 下无愧子孙

——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孔泉讲述提案背后的动人故事

本报记者 付裕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后，对外友好界委员集体提交一件界别提案，名为《关于逐步完善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的提案》。

在此前的多次调研和交流活动中，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孔泉作为召集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得到了对外友好界委员们的重要支持和鼓励。这件提案也成为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

为此，本报记者特别专访孔泉委员，讲述提案背后的动人故事。

让“国宝”回家

“我到现在，经常想起龙门石窟当中，那些没有佛首的佛像的样子。”开门见山，当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孔泉谈起撰写《关于逐步完善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的提案》初衷时，这位从事外交工作46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风度翩翩的外交家，不免深深动容。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北宋诸朝的营造，断续修建长达400多年。其分布在伊河两岸的崖壁上，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现存窟龛2345个、造像近11万尊、碑刻题记2800多品、佛塔70余座的庞大古代雕刻群。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去年夏天，对外友好界委员为落实全国政协主席会议要求，到河南调研。其中重要一站，就是洛阳龙门。”孔泉介绍道，除卢舍那大佛以外，当时，有一尊佛像因其呆萌的形象成为“网红”，被游客亲切地称为“剪刀手大佛”。这尊“剪刀手大佛”原本位于“宾阳三洞”中最北端的“宾阳北洞”中，是一尊阿弥陀佛。他端坐在方形座上，左手下垂，右手向前伸出两根手指，看起来非常像现在人们拍照时摆出的剪刀手手势，特别可爱。当时，很多游客都在与这尊大佛合影拍照，这里也是龙门石窟中人气最高的网红打卡地点之一。

在调研中，很多委员都观察到，这尊阿弥陀佛后面的一尊佛像，佛身犹在，佛首缺失。孔泉就下意识地问当地工作人员：“这尊佛像的佛首哪去了？”那位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佛首是被盗走的，如今还保存在日本。”说着，他拿出手机，将佛首的照片拿给委员们看。

“当时，我们的心情啊，真是五味杂陈。”孔泉感叹道：“一边是在龙门石窟众佛像中间，没有佛首的伟岸佛身，一边是保存在环境幽雅、灯光柔和的博物馆中，安静慈祥的佛首。两种情景的强烈对比，实在让人感到非常难受。”

后来，委员们了解到，龙门石窟虽然以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题材之多样、雕刻之精美、蕴含之丰厚而蜚声中外，但伴随而来的是多年的破坏、盗掘、偷运。据统计，单单是石窟集中的龙门西山被盗痕迹就多达780多处。

当时，就有很多委员在说，这件事情一定要重视，要集体想想办法。调研考察的路上，委员们就一直在不停地讨论研究。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联合提案，商量一下具体应该怎么办。孔泉解释道：“因为我是对外友好界的召集人，所以，就在2022年全国两会当中，代表对外友好界委员提出《关于逐步完善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的提案》。”

最大的心愿

孔泉专程赴法国库鲁深山，看望200多年前离开云贵来此定居的苗族后裔。

《关于逐步完善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的提案》中重点统计道，近年来，虽然我国建立的打击追缴走私文物联合机制，遏制了盗墓走私的猖獗势头，但对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掠夺等非法手段而流失海外的大量珍贵文物，追索却鲜有成果。

据估算，目前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大概有1000万件到1500万件，其中一、二级文物达到了150万件到200万件。

在撰写提案的过程中，孔泉回想起了几件特别难忘的往事，都与海外流失文物有关。孔泉回忆说：“在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期间，我曾经应邀到枫丹白露宫参观。当时，在密室一般的中国馆里，我看到了一尊非常精美贵重的铜胎掐丝珐琅麒麟，这是来自圆明园的文物。看到它的第一眼，我的感受就特别震撼、心情特别复杂。到现在，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麒麟的样子。它张嘴作嘶吼状、跃动有力，栩栩如生。而且，它通体填海蓝珐琅为地，掐铜丝作鳞纹，以宝蓝珐琅点缀，颈部饰以绿鬃，眉毛胡须皆外展鎏金，异常生动而华美。”

枫丹白露宫是法国最大的王宫之一，其风景绮丽、古迹众多，是著名的文化遗产，其始建于12世纪，是曾经法国君主的城堡和宫殿。1981年，枫丹白露宫被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其中，枫丹白露宫中国馆收藏有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

2015年，枫丹白露宫遭遇盗贼洗劫，盗贼不到早晨6点就溜进博物馆，7分钟内即逃离现场，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枫丹白露宫中国馆15件珍贵展品失窃，其中，就包括这件铜胎掐丝珐琅麒麟。孔泉说：“我当时在国内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震惊、非常痛心。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情，都觉得非常难过。”

还有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发生在吉美博物馆。吉美博物馆是世界上以收藏东方文物著称的著名博物馆之一，由爱好艺术的里昂实业家埃米尔·吉美创办，是世界著名东方艺术博物馆。

“我在吉美博物馆参观时，曾经看到过非常精美的敦煌写经和佛教幡画。这些敦煌文物，是20世纪初伯希和从我国敦煌弄走的。”孔泉回忆道：“看到这批文物的时候，我的心情也非常复杂。精美的敦煌文物，虽然保存在良好的博物馆环境中，却百余年来一直远离故土。这些文物，一方面展示着中国文化的灿烂璀璨，但另一方面，却又让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分离之痛。”

“还有一件关于海外流失文物的事情，就是2008年时，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在法国上拍。”孔泉回忆道：“当时，佳士得拍卖行对外宣布将对外公开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孔泉上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不久，北京奥运会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筹备期间，海外流失文物问题变得深刻且复杂，明显涉及外交、文化、司法等等多个领域，牵动着全民族的神经，又在协调、流程、做法方面颇具难度。

随后的2009年2月，蔡铭超在法国巴黎拍下了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随后，蔡铭超表示不会付款，并称自己只是尽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国际舆论随即又陷入漩涡之中。当年3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回应兽首拍卖事件，认为坚持拍卖被劫掠的圆明园文物，违背了国际公约精神和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

时间又过了5年。2013年4月，法国皮诺家族掌门人来到大使馆，表示已经从文物原持有人手中买下这两件兽首，为了避免炒作，向孔泉做了通报，表达了无偿捐赠给中国的意愿。双方就兽首回归事宜进行了积极沟通与联系，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捐赠仪式，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终于“回家”。

整件事情，恰好发生在孔泉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但是，中国外交人员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所以，人们很难知道他们在其中的斡旋、努力、坚持和多方协调沟通的故事。

“我一直记得故宫博物院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所举办的一场交流展览的名字，叫做‘重扉轻启——明清宫廷生活文物展’。重扉轻启，意为将昔日禁卫森严的皇宫中的一道道门扉徐徐打开，让观众徜徉其中。”孔泉回忆道，2011年，这场展览作为故宫与卢浮宫合作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和2008年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卢浮宫·拿破仑一世”展的交换展览，带给观众的不仅是精美的传统文物呈现，也更加生动、更加直观的促进两国民众深入交流。

“富有诗意的文物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带给观众的不仅是历史沉淀的深入呈现，也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巩固了友好合作的基础。”孔泉认为：“在未来，随着展示方式的多元发展和多媒体技术的逐渐升级，文化交流活动将更为频繁、更为多样的跨越时空阻隔，成为各国人民深入了解、深度交流的沟通方式。这也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

“上不负祖先，下无愧子孙。让海外流失文物可以安全回家，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孔泉说道。

深刻且复杂

海外流失文物追索，首先应有完善的法治保障。“建议在文物保护法中增加追索流失文物条款，明确追索主体和职责。对于历史上非法出境的文物，声明国家保留追回的权利。对被盗考古类文物的流失，应明确此类文物属国家所有，便于有效利用国际法机制展开追索。”孔泉表示，还应修订文物出入境等相关制度，做到既管得住文物的非法流出，也应管住外国文物的非法流入。

尤其是在海外文物追索的法律方面，一定要重视申诉链条的完整性问题。要以正式书面的形式，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在漫长艰辛的追索过程中留下我们的声音和证据。

在完善法治保障、文物追索步骤的同时，《关于逐步完善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的提案》建议，在国际合作层面，有关部门要同遭受同样命运的主要文物流失国深入协商，形成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诉求、共同的纲领，推动签订新的国际条约，对归还历史上大量流失的珍贵文物做出明确的呼吁。

同时，要着眼长远，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文物追索事业。孔泉表示，文物是属于国家的、民族的，因此文物追索也需要全民、全社会行动。要加强公众对追索流失文物意识和情怀的培养和引导。

目前，我国民众对流失文物了解甚少，对文物追索的认知度也不高，因而需要重视提高我国民众对流失文物的普及性认识，既要有对流失文物复杂历史背景的全局意识，也要有强烈的依法追索意识。对于流失文物的全民追索，孔泉建议：“提高公众对于海外流失文物的意识，不仅基于我们对中华文明传承的热爱，也是提高公众在海外文物追索方面的参与度。”

“通过民众的持续积极参与，增强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尝试建立历史流失文物互动网站，吸引并指导民众通过图片定位等多媒体、新媒体形式，制作流失文物全球足迹图等互动形式积极参与，也可以将旧图新景对比或将散落各地的文物碎块，制成网络拼图等等，吸引民众的关注。这也可能形成文物部门目前所不拥有的、巨大的流失文物数据库，为流失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的不断完善奠定坚实基础。”孔泉表示，将海外文物与社会公众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全社会的行动，正向引导传承传统文化的公众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组织具有象征性的行动，让海外文物追索行动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也让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问题上作出一些严肃的回应和思考。

履痕处处 LVHENCHUCHU

旗帜在中原大地飘扬

周春艳

2021年9月23日至11月11日，“旗帜飘扬——党旗国旗军旗诞生珍贵史料展”（以下简称“旗帜飘扬展”）在河南进行了为期50天的巡展。“旗帜飘扬展”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共同举办。做好这次展览是河南省政协2021年度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河南省政协服务全省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展览广受关注，深受欢迎，展览受众人群之多、观展效果之好、社会反响之强烈是河南省政协承办国家级展览中前所未有的。

邀请“旗帜飘扬展”来河南巡展的想法是在2021年度工作部署的过程中逐渐明确。河南省政协文史馆的成立是河南省机构改革过程中完善政协机构职能的一个新创举，文史馆的工作在2021年初开始由笔者分管，首先明确一定要做好文史馆的开门之作，将河南省政协主席刘伟提出的“三个一流、四个之家”理念贯穿于展览工作全过程，展现河南省政协文史馆作为人民政协光辉历程和重要成就的展示窗口的新作为新担当。“旗帜飘扬展”以党旗、国旗、军旗的诞生为主题，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举办这样的展览，不仅能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高质量高标准服务政协履职，更有利于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打造具有鲜明政协标识度、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党史学习教育品牌。

展览主题确定之后，布展非常重要。河南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而“旗帜飘扬展”本身内容好、质量高，如何使展览融入河南红色资源更具本土特色就成了件难事。河南铁路工人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运动中团结一心、不畏生死，在中国革命史、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大别山腹地的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如果能增加这些内容和相关实物，不仅契合展览主题、丰富展览内容，而且有利于赓续红色血脉，让二七精神、大别山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放射出更加灿烂耀眼的光芒。经过一系列讨论以及和郑州二七纪念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河南省军区国防教育基地展馆等红色革命纪念馆积极沟通协调，最终在展览中增加了二七大罢工的相关史料及实物，增加了象征着从大别山诞生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一军等八支革命队伍的八面旗帜，确山起义军的旗帜、袖标、红四军第11师佩戴的袖章及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各个时期的纪念奖章等。布展的具体工作由河南省政协文史馆的同志们负责落实，他们前往郑州二七纪念馆借取展览文物时恰逢暴雨，雨水造成整个展馆停电闭馆，同志们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前进，打着手电筒逐个展柜对照确认展品，克服重重困难，凭着一股子冲劲儿安全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展览要让参观者看得清、听得懂、记得深、难忘怀。讲解员队伍由12人组成，其中专业讲解员4人，机关和大学生志愿者讲解员8人。在讲解员培训方面，为提高练习效率、节约时间成本、增加实战经验，我们建议在省政协机关里设置“旗帜飘扬展”模拟展厅，邀请中国政协文史馆首席讲解员和河南博物院社教部主任来到模拟展厅对讲解员们开展集中培训，并进行现场模拟和定期考核。10余名讲解员精准把握展览内容、深刻理解展览内涵、充分展示展览精髓，通过400余场次精彩生动的讲解，让广大参观者听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难以忘怀，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深深感受到无上光荣、无比自信，深刻感受到党旗国旗军旗来之不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展览于9月23日上午在郑州升达艺术馆正式开幕，开幕式得到全国政协和河南省委的高度重视。在50天展期内，“旗帜飘扬展”共接待了来自省直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干部群众近3万人，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感受红色魅力、坚定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的红色教育“打卡”点，营造了党史学习教育的浓厚氛围，为广大干部群众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观展中感人至深的场面比比皆是，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也有奋斗在平凡岗位的普通市民；有坐着轮椅的耄耋老人，也有天真活泼的学龄儿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有着71年党龄、96岁高龄的离休干部王世青老同志，本来他坐在轮椅上参观，当进入展厅看到国旗、党旗、军旗，他坚持让同志们把他从轮椅上扶起来，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仔细地观看一件件文物，一张张图片，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个故事，眼中饱含着激动的泪水，坚持着看完了展览全程。

“旗帜飘扬展”结束之后，我们将此次展览制作专题电视片、数字化展厅，依托河南省政协门户网站进行展示，搭建线上红色教育服务平台，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反响良好。

（作者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宝藏物语 BAOCANGWUYU

庙孱鼎

庙孱鼎 西周晚期 岐山县博物馆藏

1975年2月，庙孱鼎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1号青铜器窖藏，是岐山董家村1号窖藏时代最晚的器物之一。

庙孱鼎铭文内容简明扼要，说明了作器者庙孱和子孙荣耀，讲述了西周时期的宗族故事。

两张“红军票”，一场“纸币战”

曲曼丽 吕东浩

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发展史、货币发行史，也是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缩影。

近日，大连市中山区政协委员、大连票证文化陈列馆副馆长袁超向笔者展示了两张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发行的“苏联红军司令部”纸币，面额分别为10元和100元。他说，这两张被称为“红军票”的纸币，发行过程之曲折、国际影响之广泛、政治意义之巨大、印制流通之短暂，在整个货币史上都较为罕见。

袁超表示，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和货币发行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红军初创时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经苏区苏维埃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发行流通货币和纪念钞，充分体现了红色金融普惠为民的初心，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大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改革实践的先行之地，有着丰富的红色金融文化禀赋与历史研究价值。”袁超介绍说，现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中山广场支行便是旧时朝鲜银行大连支店旧址，上了年纪的老大连人都习惯把这里称作“关东银行”。

1913年6月，朝鲜银行决定在大连设立支店。据记载，其银行建筑的最美之处是拥有六根高大的廊柱，可见当年之奢华。1920年12月，这座洋楼正式竣工，并从此成为大连的金融中心。

1945年12月8日，大连市政府接管朝鲜银行大连支店，改名为大连中国工业银行总行。

作为当时东北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旅大地区肩负起收集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而当时多国货币混乱的金融市场导致当地生产停滞，统一货币、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生产是当务之急。

同年12月28日，大连市政府组建了中国工业、中国农业、中国商业三家大连地方性银行，1946年7月1日，又将三家银行合并成立了大连银行，后取名为关东银行，规定苏联军用票、伪满洲币、朝鲜币三种货币等值同价，准予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有效地遏止了金融黑市活动。

1947年，国民党“视察团”携带了大量的苏军货币，打算在大连抢购物资，扰乱金融市场。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连特殊解放区进行了第一次货币改革，对全区的苏联红军票、伪满洲币加贴印花，规定只有贴上印花的钱才能使用，而且所有货币登记和加贴印花必须在5月23日至27日间完成，逾期一律作废。5天内快速完成的货币改革，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统治区苏军票和伪满币的流入。

经过这次货币改革，中国银行历史上少有的钱币加贴现象从此诞生，开创了流通币转化为地方币的先例。

1948年11月14日，大连市进行了第二次货币改革，由关东银行发行“关东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和金融的稳定，大连地区形成了以“关东币”为流通货币的格局。

1950年5月，关东银行由东北银行接管，更名为东北银行旅大分行，继续营业。袁超表示，大连解放初期，由关东银行主导的两次货币改革，不但稳定了货币市场，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还对金融有效管理和运行经验进行了积极探索，为之后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